

# 近年来中国近代社会变迁研究的学术反思

王日根 陈瑶

[摘要] 近30年来,关于中国近代社会变迁问题的学术研究经历了从“西方中心论”到“中国中心”的转变,随之而来的争论是中国近代社会变迁的动力与机制是否来源于传统时代向近代的转移?在社会变迁过程中官方与民间各自发挥了怎样的作用?是官方主导还是民间主导?传统社会形成的地域性在近代社会变迁中是否仍起作用?对近年来关于上述问题研究的简述与反思必将有助于研究的深化。

[关键词] 中国近代 社会变迁 学术回顾 反思

[中图分类号] K2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10) 01-0107-07

中国传统社会如何逐渐转变成近代社会的问题,始终是中外中国史学者关注的焦点。上世纪70年代末以前,史学界还是以中国如何在回应西方的冲击中产生结构性转变为提问方式,或以传统与近代的二元对立模式来解释近代转型。但改革开放后,关于中国近代社会变迁问题的思考出现了较大的转型。

一、西方话语曾长期主导中国近代社会变迁思维范式的转换,但近年来对此的反思以及“学术本土化”的追求渐成气候

自柯文(Paul A. Cohen)系统地阐述“中国中心观”以后,学术界对于中国近代历史的本土脉络已经有所关注,开始寻求一种用以描述中国本土景象的“内部取向”的可靠范式。到了20世纪90年代,哈贝马斯“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的概念和理论,开始被美国中国史研究者借用来探讨中国近世社会。他们试图从国家和社会在“公共领域”的互动来描述晚明以来中国社会的变迁。国家—社会二分框架的导入,引起国内学界地方史个案研究的潮流。这些“内部取向”的研究对于转变国内传统的宏大叙事史学风格有很大的帮助,也引起我们在具体的研究中逐渐改变对历史问题的提问方式。

美国中国学界最早开始运用“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理论研究近代中国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其中较早的有萧邦齐(R. Keith Schoppa)关于20世纪早期浙江精英与政治发展的研究,<sup>[1]</sup>玛丽·兰金(Mary B. Rankin)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浙江士大夫与政治变迁的探讨,<sup>[2]</sup>罗威廉(William T. Rowe)对19世纪晚期汉口的商业和商人团体、<sup>[3]</sup>冲突与城市共同体的研究<sup>[4]</sup>等等。然而这些研究无一例外地试图说明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脉络与西方市民社会一样,故而强调地方社会空间相对于国家的自主性以及地方精英与国家制衡的能动作用,认为社会力量与国家在公共领域里进行对抗和冲突,因而这种理论的移植曾受到普遍的质疑,引起了广泛的讨论。1992年5月,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校区特别为此举办了研讨会,《近代中国》(Modern China)期刊在翌年春季号发表了讨论会上的主要论文。<sup>[5]</sup>美国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著名学者如魏斐德(Frederic Jr. Wakeman)、黄宗智(Philip C. C. Huang)等人认为,近代中国有

作者简介 王日根,厦门大学历史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福建 厦门,361005);陈瑶,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博士候选人。

其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发展特点，并不存在类似于西方那样的市民社会或公共领域，因而用源于西方的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理论来分析近代中国的历史，是不恰当的。黄宗智提出国家与社会之间存在“第三领域”（the third realm），代替公共空间以避免与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相混淆。

一些学者在具体的研究中反思这种学术发展趋势，逐渐意识到对于“国家”、“社会”、“公共领域”、“第三领域”概念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只是方便了我们的表述，并未促进对于历史真实的了解，而对国家与社会之间分界线的追寻更是如此。夫马进在善会善堂史方面的开创性研究，实际上是对这种学术发展思路的回应。他的研究表明，从明末到清末期间，事实上在善会、善堂事业广泛开展的过程中，国家的影响也在增加，他把这一现象称之为“社会与国家的混淆”。<sup>[6]</sup> 大多数回顾“国家—社会”分析框架和“市民社会”理论在中国史领域应用的评述忽视了夫马进这一研究的贡献。<sup>[7]</sup> 甚至有人认为其研究借鉴了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近代公共性的概念。<sup>[6]</sup> 杨念群也认为不必在“国家”、“社会”之间做出一个清晰明确的边界划分，因为国家与社会的对峙本来是一个非常西方化的提法，西方社会学领域通用的“公共领域”、“市民社会”等概念移植到中国之后，在解释中国社会转型时遇到了困难，正是因为这些概念在西方已经被清晰地界定为一个具体的场域，也就是通过咖啡馆、出版物、社团等形成的所谓“中产阶级”，而这个场域在中国是不存在的，即使能发现某些表象，也是移植而不是自发形成的，完全不同于中国本土的自治方式，所以我们应该注重一些经过严格界定和验证的“中层”概念。<sup>[8]</sup> 王日根在明清基层社会管理的实证研究基础上提出“共域”和“自域”的概念和分析方法，体现出对于理论本土化的追求。他提出在中国传统社会管理中，有官民均可发挥作用的管理领域，如赋税的摊征、水利活动的开展、教育事业的建设等，他将其称之为“共域”；同时也有官民各自开展自我管理的领域，他将其称之为“自域”，包括官方的“自域”和民间的“自域”。在这一概念定义之下，他认为清代民间自域与共域出现了合流的趋向，或者说民间自域依附于官府，求其庇护。在共域范围，民间力量和官府力量共同发挥着作用。冲突并不代表官方与民整个体的矛盾冲突，一般也不至于发展到引起权力结构或既定社会政治秩序发生变化的地步。民间力量参与地方共域的事务往往并不意味着地方自治，而多为“补官治之不足”。<sup>[9]</sup>

由以上讨论可以看出，学者们在一定程度上达成了共识，即在分析清代中国问题时，不宜套用“市民社会”概念，然而基本上都同意自明末以来，在中国社会里有一特别领域，其中官方与民间力量均有参与，并互有影响，在不同时代，两者有不同的比重、不同的互动关系。<sup>[10]</sup> (P319-320) 而在这一空间中寻找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分界线只会走入将国家和社会看作铁板一块、以官代表国家而以绅代表社会的困境。

在“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理论的影响下，关于“国家—社会”之间公共空间的问题出现了不少以之为理论依托的研究成果。兰金和罗威廉的研究堪称代表之作，两者之间也有很多相似之处。兰金把晚清政治语汇划分为三重概念：即官、公和私。清代公共领域形成与国家权威相对峙的规模主要有三大表现：一是晚明随着中央集权的松弛和强迫式轮流服务于收税的里甲制的崩溃，精英处理地方事务将受到新的评价，并可以增强其在地方上的地位；二是识字率的提高拓宽了科举外的就业渠道；三是绅商精英的出现。<sup>[11]</sup> 罗威廉用“公共领域”的出现概述 19 世纪在汉口城市服务系统和社会福利领域的发展，描述了国家向社会让渡权力来标示出公域的范围，认为这种权益的让渡是城市周围的外界压力以及精英构成的变化的结果。<sup>[4]</sup> 两者都认为中国式的公共领域具有“管理”（management）的特征，以之来区别于西方特指意义上的“公共领域”，但两者对于国家在公共领域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有不同的评价。兰金相对比较强调国家在塑造地方公共领域中的作用，而罗威廉认为公共领域的扩张几乎完全基于传统社会内部的动力。杨念群总结学术界对“汉口模式”的批评与反批评，认为探究公共领域的适用度似应首先打破西方中心论的观念。罗威廉思维中的矛盾困局是很明显的，他在担心把中国历史变成西方发展的一个理想式投影的同时，所使用的诠释工具如“公共领域”等西方式的概念使得他不可避免地仍以欧洲史和西方经验基础来衡量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sup>[12]</sup> (P126)

近年来，中国学者在对这一理论引入中国史研究引起的问题进行讨论的同时，也试图借用这一理论对中国其他地域和不同的公共团体进行实证性研究。在早期的讨论中，几乎所有的论者都是直接借用西方的定义展开对于中国的论述，缺乏对近代中国情况的整体把握和具体问题的深入研究，结论大多为主观判断，<sup>[13]</sup>因此对于近代市民社会具体问题的研究显得更为重要。王笛关于晚清长江上游地区公共领域的研究认为，19世纪末汉口公共领域的扩张，主要是基于社会内部的动力和地方精英积极活动的结果，政府的作用并不明显，而晚清成都公共领域的发展则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官”推动的影响，同时加上地方士绅的合作，尽管在这里社会与国家仍存在着矛盾冲突，但相对而言两者之间的互动合作，亦即国家对公共领域扩张所发挥的作用与影响更为突出。他借此说明“公共领域”并没有一个全国统一的模式，不同地区，甚至同一地区的不同城市在公共领域发展过程中，由于各自发展的环境不同，因而展示出了相异的特点。<sup>[14]</sup>近来王笛对于成都街头文化的研究采用了公共空间（public space）<sup>[15]</sup>这一提法对于摆脱西方语境和特殊内涵的词汇和提倡从实证出发的本土理论建构具有很大的意义。笔者认为可以进一步追究街民的来源，街头文化与乡野文化的同异之处，或者可以更好地理解近代以来成都这个城市公共空间发生的变迁。

马敏关于绅商的研究和朱英关于商会的研究，通过对商会的具体考察，论证了中国市民社会的存在及其特点。他们认为明清时期没有新型社会阶级力量的发生和市民权力的扩张，19世纪末以前，中国社会不存在任何类似西方那样脱离国家控制的独立自治社会，直到20世纪初，随着商会等一批新型民间团体和自治机构的产生，中国城镇中传统公共领域开始发生某种带有体制意义的变革，城镇公共领域开始突破传统慈善、教育、公益的狭小格局，扩张到某些原本属于国家权力影响和控制之下的领域。这些新式民间社团组织在组织形式、构成原则、社会职能等方面都较多地借取了西方近代社团组织的经验，具有较浓的民主意识，在许多方面可以和哈贝马斯所揭示的欧洲中产阶级初现时的“公共领域”相提并论。<sup>[16]</sup>（P292-294）不过，他们的研究还是从“公共领域”的概念出发，寻找中国近代史中与之能够匹配的实体和组织，过于强调20世纪初新式民间团体对于传统的摒弃，以及新式商人西化的一面。邱捷关于清末广州七十二行的研究就提出商会不能代表全部、甚至不能代表多数商人，认为不能过于强调行会与商会之间、“绅”与“商”之间的对立。<sup>[17]</sup>

二、区域性的实证研究成果丰硕，显示了历史发展的多样性、生动性，但有些仍过于注重城市而忽视农村或农村与城市的关联，本土性的揭示尚不够深入

从不同角度和不同区域进行专题研究是近些年的主要倾向，其追求是为了避免理论先行，目的是回归历史的本来状态，这其中有很多可喜的成果。但有些实证研究仍脱不掉单纯讨论城市或只循着西方模式，缺乏对本土特色的追究。

邱捷关于清末广州市民的集庙议事的研究，通过细致论述清末广州居民如何在街庙讨论和处理涉及本街区公共利益的事务，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与“近代化”进程关系密切的广州商人的观念和行还相当传统和保守的实际状况提出了疑问，认为有必要更多注意到广州商人重视传统甚至保守的表现，而“集庙议事”之类的传统对广州城及其居民走向近代起着不可忽视的制约和影响作用。<sup>[18]</sup>然而正如作者自己所说的，广州是研究中国历史上“市民社会”应该予以关注的城市，夫马进在善会善堂研究中也一再猜想广州的情况，而事实上如何单凭对报纸资料和某种社会组织的考察远不能说明广州这个城市社会空间的整体状态和发展趋势。邱捷在近期另一篇论文中对晚清广东士绅控制乡村基层社会的权力机构——“公局”的研究，<sup>[19]</sup>虽然文中意识到某些县形成了从县一级到乡一级的公局体系，却没有从结构上分析县城中的总局与乡局之间、乡局内部之间相互制约的关系，而是强调其功能上的意义，从而将两者目为权益完全相同的机构，以乡村基层权力机构概括论述之。

赵世瑜、孙冰通过对浙江双林镇权力结构历时性变化的考察，认识到这个市镇上由士绅发起创立的崇善堂逐渐成为权力网络核心的过程，并以此说明市镇与乡村及城市的权力运作之差异。<sup>[20]</sup>他们的研究



区别于夫马进对杭州、苏州之类省会城市出现的善堂官营和善举徭役化现象，并以此推断在较高级的行政中心，国家的渗透强度更大，而实际上该研究的瑕疵就在于缺少行政区域层级之间的联系和比较分析，从而很难具体说明善会善堂在省会城市与市镇的运行到底为什么有差异。邹怡通过对清代杭州消防事业组织发展过程的考察，认为杭州民间消防力量的兴起方式表明民间公共事业的开展，并不是与国家权威相对抗，而是弥补国家能力之不足。<sup>[21]</sup>且不说他在叙述中对于夫马进所提出的“善堂官营化”和“善举徭役化”在对象上有所混淆，其研究也缺失“绅士”这一层面，而夫马进认为杭州善举联合体中的善堂绅士在地方官府和救火义集之间还起到了沟通桥梁的作用。<sup>[22] (P474)</sup>可见，其分析仍未接近事实。

郭钦则以长沙为个案考察了近代中国市民社会的区域特质和发展特点，认为长沙呈现出保守与激进并存、新兴市民阶层力量较弱的特色，其市民社会深受历史传统影响。<sup>[23]</sup>这些结论以上海等沿海城市为参照标准，以近代企业和贸易、商会的产生作为清末民初长沙市民社会形成的标志，并以市民社会的发展作为历史发展的一定规律加诸于长沙这一城市，在笔者看来都有不妥。

除此之外，对博物馆、公园、茶馆、报刊媒体等各种类型的公共活动空间的研究也逐渐增多。关于苏州市民公社的研究具有突破“市民社会”局限于城市近代化的概念，屠雪华认为苏州市民公社不是一般的城市自治团体，而是具有明显市民社会特征的市民基层自治组织。<sup>[24]</sup>李明认为苏州市民公社影响到江苏的常熟、吴江等地区，1922年常熟城内成立了14个市民公社，一些乡还发起组织了乡一级的乡民公社。至此，市民公社的衍变展示了一条由城厢而镇，由镇而乡的运行轨迹，市民公社的势力逐步向基层社会扩张。<sup>[25]</sup>这个民国以后的案例事实上有更深层次的意义，我们从此也可看出，类似于里甲和保甲理念而形成的城—城厢—镇—乡的垂直结构一直是一种具有生命力的结构模式，正是这种结构模式让我们可以探究城市与乡村之间信息的传递。

在“国家与社会”理论分析框架下对清末公共领域与地方自治关系的问题也出现很多研究成果。如周青松在考察了上海的善堂、会社、医院、学校、公所、学会、商团等组织后，从公共领域发展的视角分析了清末地方自治的起源，认为具有独特社会背景的海公共领域的孕育和社会力量的增长，促使上海在全国率先推行地方自治，并为后来清政府在全国推广地方自治树立了榜样。<sup>[26]</sup>然而这一研究也与商会研究一样，从近代社会的一些实体中寻找与公共领域概念类似的内容，而未讨论这些实体的历史渊源及其与传统的关系。

日本学者夫马进的著作可以说是研究国家—社会之间的公共空间和公共事务的具有超越性的作品。他通过对明末以降善会善堂史的研究，提出“国家”与“社会”混淆的观点，认为“乡绅支配论”和“公共领域”说并不符合中国历史的实际，难以以之作为研究清代社会历史的基本方法。夫马进从善堂角度考察上海近代地方自治和近代化都市建设的研究也有令人耳目一新之感。他认为，善会善堂以它原有的形式是不能成为地方自治的前身的，上海的事例只属于少数的例外。<sup>[6]</sup>他从近代大众思想观念的转变来讨论上海义冢的问题，认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是由于20世纪的最初10年间，上海县城方面的权势阶层中，不仅在地方自治的政治问题上，而且在包括对死者的观念以及“善举”的理想状态在内的重大价值体系的重组所致。<sup>[22] (P638)</sup>上海在近代的发展是很多城市无法企及的，能够支撑善堂运作和城市建设事务资金的商人和行会在其他城市毕竟比较难看到，所以夫马进对上海个案的评价具有相当的客观性。然而，虽然夫马进对清代后期府城级大都市把育婴事业的前线基地伸延至镇的过程进行了详尽的研究，却难以在上海个案中将城乡的联系引入地方自治研究，这是在城市史研究中经常忽略的一个因素，而从中小县城来把握乡村对于城市事件的影响却会有更好的效果。

王卫平、黄鸿山近期的研究用比较的方法对苏州主要慈善机构进行分析，认为绅士和绅商在慈善组织中拥有更多发言权和支配权以后，慈善组织的性质依然是“官绅合办”或“官堂”，极力强调官方在社会公共事务中的协助、监督和控制，提出慈善组织并不能被视作近代中国所谓的“公共领域”。<sup>[27]</sup>这一研究在比较研究中得出“官民合作”模式，实际上也是将官和民作为两个利益整体来进行分析，对于传

统士绅与绅商之间的区分主要以其参与的社会活动为标准，在笔者看来也有将个体身份和文化认同的连续性进行分割的危险。

关于“国家—社会”理论框架、“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理论的讨论及其引发的实证研究已经受到学术界的广泛重视，很多评述文章对已有的观点进行了总结分析，基本上达成了一个共识，即这些由西方引入的概念和理论虽然有其西方思想发展的脉络，却可以作为转变中国近代史研究提问方式和思维方法的契机，以更加开阔的视野和思考来使用这些研究方法，对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变迁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然而这些实证研究在整体上的把握仍显不足，以江南地区的研究为例，关于善堂善会和商会已有很多，<sup>[28]</sup>但多局限于城市空间的研究，并且对一个区域公共空间的整体性研究尚不多见，而对于公共空间的研究应该是一个整体性的评价，或者说应该是在整体性评价下对城乡、官绅的具体实践予以区别分析。

三、对民间组织与社会变迁关系研究的争论，包含了对官民界限、官民各自作用以及中国社会变迁特征的思考，其中深化空间巨大

有的学者从仓储等民间组织设置看其社会稳定和赈灾救荒方面的功能。20世纪30年代，邓云特（邓拓）的《中国救荒史》（上海书店1984年版）对我国历史上救荒经验和措施进行总结和论述，认为仓储是一种积极备荒救荒的政策，并分析利弊。1960年，萧公权在《中国乡村——19世纪的帝国控制》<sup>[29]</sup>一书中将常平仓、社仓和义仓等仓储制度作为一种灾荒时期的控制体系进行分析，认为清朝统治者通过地方仓储网络在非常时期以出售、借贷或无条件形式将谷物分发给需要的人，帮助民众对抗自然灾害，以保证他们的缴税能力，从而达到控制社会秩序的目的。这一观点一直影响着后来学者对于仓储在国家统治社会中的功能的认识。20世纪70年代起，法国学者魏丕信（Pierre Etienne Will）的荒政史研究的代表作《18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王国斌（R. Bin Wong）的博士论文<sup>[30]</sup>将仓储制度与社会变迁的研究推进了一步，之后两人合著的《养民：中国的国营民仓制度，1650-1850》<sup>[31]</sup>考察了清代仓储系统的法律规定和政策，分析了当时仓储的经济结构模式和区域差异，从与欧洲国家的粮食供应政策的比较中得出结论，认为中华帝国晚期的民仓体系虽然面临经济结构上的困难、财政的约束和政治上的抨击，仍然以一种成熟的操作网络出现。

近年来，国内关于地方仓储的研究很多，且多在“国家—社会”框架下进行论述。陈春声的论著认为，清代以来广东的仓储是政府与士绅进行社会控制的一种方式，与当地的米价和米谷市场的运作机制有着密切的关系，从清代前期以常平仓和社仓为储粮备荒的主要形式，到清末义仓的兴起而逐渐代替常平仓和社仓的社会功能，反映了一个政府在社会福利和公共保险事业方面的职能逐渐被士绅取代的趋势，从而认为18世纪广东基层社会控制权正逐渐下移。<sup>[32]</sup>罗一星在对明清佛山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中对佛山的义仓体系进行了分析，认为义仓的归属问题集中地表现了民间自治系统对官府权力系统的抗衡，义仓值事产生途径和管理办法的改变表明了社会控制权从官方向民间的转移，表明了民间自治系统的扩大和发展。<sup>[33]</sup>

有关长江上、中、下游区域仓储的研究成果也有不少。王笛对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的研究认为，在咸丰之后，各地仓储的作用实际已有改变，即以“备荒”为主转向军事和地方开支为主。近代以后这种带救济性质的慈善组织的频繁出现，表现了地方士绅更广泛地参与社会活动和干预社会生活；是传教士在上游举办的许多慈善事业的影响，与社会问题的增多、社会情况的恶化有关。这些地方慈善组织的增多，对保持社会的稳定是有一定作用的。<sup>[34]</sup>（P517,527）袁海燕通过对江西新城县中田镇的两大家族倡导建立的乡族义仓广仁庄的个案考察，认为乡绅们通过控制广仁庄而实现对基层社会的控制，但仍离不开官府的监督，政府对地方的管理由垂直控制转向地方协调。<sup>[35]</sup>任放在其市镇研究中也涉及到义仓，他认为明清时期市镇与仓储的关系密不可分，在长江中游地区，民间仓储大量设置于市镇，这表明市镇在明清时期仓储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市镇具有明显的社会保障功能，这种功能使其自身的商业机能更加凸显。

[36] 姚建平对清代两湖地区社仓的研究认为,这一地区社仓管理模式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把社仓制度和保甲制度相结合,体现出经济手段和政治手段并重的基层控制理念,[37]这在一定程度上类似于萧公权将仓储制度与里甲赋役制度相结合的讨论,但姚文以湖南省长沙县为典型个案,论述其在社仓管理上明显的里甲层级模式,与笔者所论述的区位有一定的相似性。白丽萍认为清代两湖平原的社仓,通过借贷、赈济和平糶多种手段相结合,和其他粮仓一起,共同在基层社会备荒救灾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并通过和里保甲制、乡绅的密切联系,成为维护基层社会秩序的手段之一。[38]吴滔关于清代江南社区赈济的研究认为,区域社会社区发展模式与地方赈济密切相关。在清代江南社会中,义仓管理运营乃至社区赈济表达了血缘和地缘的关系,宗族组织往往通过发挥其功能性职责而不是固守系谱观念,以便在社区整合中真正达到控制地方社会的目的。[39]黄鸿山和王卫平对苏州丰备义仓的研究认为,其在管理和运营上从由官府直接掌控逐渐转移到地方社会的士绅阶层,从传统的地主阶级绅士手中转移到具有早期民族资产阶级性质的绅商手中。这种现象不仅表明晚清时期的绅商已将势力和影响延伸到了社会领域,同时也意味着诸如丰备义仓之类的传统社会保障机构在管理上开始出现了近代化的趋势。[40]

这些涉及仓储的论著从不同的角度对仓储制度和运作形式进行研究,将仓储作为基层社会的功能组织来研究,多从个案研究出发,探讨仓储与其他基层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然而他们的研究大多局限于仓储的功能与国家—社会互动关系的讨论,对于义仓本身的运作机制以及结构性的意义讨论得并不深入,并且对于设立于县城和乡村的义仓之间的结构关系也尚少论及。自清初设义仓,就有“乡村立社仓,镇店立义仓”的规定,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市镇的增多,义仓的数目也逐渐增多,并且在一些地区形成结构性体系。笔者认为,对于义仓的实际运作、组织系统是仓储研究的一个弱点,对义仓系统如何作用于社会公共事务问题尚未进行更深入的探讨。以上成果由于资料的局限,在仓储运作和管理研究中都比较侧重其社会功能方面,使得他们的研究显得比较平面,而忽视了义仓体系在社会网络形成中的结构性意义,所以还可以更进一步发掘仓储体系作为一个结构、在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社会公共空间中发挥的作用。另一方面,在晚清城市公共事务的整体性研究中,很多学者如夫马进、王笛、王卫平等承认仓储是其中的一部分,然而却很少将仓储与善举进行比较研究。笔者认为这种对比如同将成都与武汉以及成都与上海之间“公共领域”进行对比一样重要,因为这可以让我们更清楚地理解“荒政”与“善举”之间的差异,以及这种差异带来的影响力的区别等更细节的问题。

统观以上的研究,首先,以往“国家—社会”框架下的公共领域研究力图寻找国家与社会的界限,其实,国家与社会往往均需落实到个体或群体上,如杜赞奇将士绅分为“保护型经纪”和“赢利型经纪”。我们进而关心的是,无论是官员,抑或士绅,都可能祭起国家利益的大旗,或合作,或彼此竞争。在清末地方自治运动中,新旧士绅之间、士绅与乡间团正仓长之间以及士绅与知县、巡抚等官员之间的关系纷繁复杂,有的地方表现为相互合作与配合,而有的地方则是相互较量,此长彼落。其次,以往研究或多从城市空间出发,局限于城中公共事务的范围,看不到乡村与城市的关系。然而事实上所谓的城市精英却总是与乡村有不可忽略的联系,城市精英与乡村的脱离只是现代中国才出现的新现象。

#### [参考文献]

- [1] R. Keith Schoppa. *Chinese Elites and Political Change: Zhejiang Province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M].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 [2] Mary Backus Rankin. *Elite Activism and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Zhejiang Province, 1865-1911* [M].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 [3] William T. Rowe. *Hankow, Commerce and Society in a Chinese City, 1796-1889* [M].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 [4] William T. Rowe. *Hankow, 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a Chinese City, 1796-1895* [M].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 [5] William T. Rowe. The Problem of “Civil Socie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J]. Mary B. Rankin. Some Observations on a



Chinese Public Sphere [J]. Frederic Jr. Wakeman. The Civil Society and Public Sphere Debate: Western Reflections on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 [J]. Philip C. C. Huang. "Public Sphere" / "Civil Society" in China? The Third Realm between State and Society [J]. *Modern China*, Vol. 19, No. 2, 1993.

[6] 夫马进. 中国善会善堂史——从“善举”到“慈善事业”的发展 [A]. 中国社会历史评论 [M].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6.

[7] 张志东. 中国学者关于近代中国市民社会问题的研究: 现状与思考 [J]. 近代史研究, 1998, (2); 邓正来, [英] J. C. 亚历山大编. 国家与市民社会: 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 [M].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9; 杨念群. 中层理论——东西方思想会通下的中国史研究 [M]. 南昌: 江西教育出版社, 2001; 徐松如, 潘同, 徐宁. 关于国家、民众、地方相互关系的理论与研究概述 [J].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 2002, (6); 邓京力. “国家与社会”分析框架在中国史领域的应用 [J]. 史学月刊, 2004, (12); 闵杰. 近代中国市民社会研究 10 年回顾 [J]. 史林, 2005, (1); 朱英. 近代中国的“社会与国家”: 研究回顾与思考 [J]. 江苏社会科学, 2006, (4).

[8] 杨念群, 沈巍. 昨日之我与今日之我——杨念群教授访谈录 [J]. 历史教学, 2004, (7).

[9] 王日根. 明清时期社会管理中官民的“自域”与“共域” [J]. 文史哲, 2006, (4).

[10] 梁其姿. 施善与教化: 明清的慈善组织 [M].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1.

[11] Mary B. Rankin. Some Observations on a Chinese Public Sphere [J]. *Modern China*, Vol. 19, No. 2, 1993.

[12] 杨念群. 中层理论——东西方思想会通下的中国史研究 [M]. 南昌: 江西教育出版社, 2001.

[13] 闵杰. 近代中国市民社会研究 10 年回顾 [J]. 史林, 2005, (1).

[14] 王笛. 晚清长江上游地区公共领域的发展 [J]. 历史研究, 1996, (1).

[15] 王笛. 街头文化: 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 1870-1930 [M]. 李德英, 谢继华, 邓丽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16] 马敏. 官商之间——社会剧变的近代绅商 [M].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17] 邱捷. 清末广州的“七十二行” [J]. 中山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4, (6).

[18] 邱捷. 清末广州居民的集庙议事 [J]. 近代史研究, 2003, (2).

[19] 邱捷. 晚清广东的“公局”——士绅控制乡村基层社会的权力机构 [J]. 清史研究, 2006, (2).

[20] 赵世瑜, 孙冰. 市镇权力关系与江南社会变迁——以近世浙江湖州双林镇为例 [J]. 近代史研究, 2003, (2).

[21] 邹怡. 清代城市社会公共事业的运作——以杭州城消防事业为中心 [J]. 清史研究, 2003, (4).

[22] 夫马进. 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5.

[23] 郭钦. 论近代市民社会的区域特质与历史轨迹——以清末民初湖南长沙为个案 [J]. 湖南社会科学, 2005, (5).

[24] 屠雪华. 试论苏州市民公社的性质 [J]. 江海学刊, 1995, (3).

[25] 李明. 苏州市民公社的衍变及现代意义 [J]. 史林, 2003, (1).

[26] 周松青. 公共领域与上海地方自治的起源 [J]. 档案与史学, 1998, (1).

[27] 王卫平, 黄鸿山. 清代慈善组织中的国家与社会——以苏州育婴堂、普济堂、广仁堂和丰义仓为中心 [J]. 社会学研究, 2007, (4).

[28] 王卫平. 清代江南市镇慈善事业 [J]. 史林, 1999, (1); 王卫平. 清代江南地区的育婴事业圈 [J]. 清史研究, 2000, (1); 朱英. 民初苏州商会的发展演变 [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6, (9); 朱英. 近代中国商会选举制度之再考察——以清末民初的上海商会为例 [J]. 中国社会科学, 2007, (1).

[29] Kung-Chuan Hsiao. *Rural China: Imperial Control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M].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67.

[30] R. Bin Wong.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Food Supplies in Qing China* [D]. PhD dissert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1983, Unpublished manuscript.

[31] Pierre Etienne Will, R. Bin Wong. *Nourish the People: The State Civilian Granary System in China, 1650-1850* [M]. University of Michigan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1991.

(下转第 119 页)

想,反映了清初社会的最新进展。不过,这种富于创新意味的思想以“三代之制”的原始民主作为依托,以《礼记》“公天下”的大同思想为准绳,又借用《吕氏春秋·贵公》“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之天下也”的民本思想,从而增添了历史的厚重感,也顺应了中国传统以古为尚的思想观念。

人类文化发展过程并非直线型的,而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上升的过程。如果把人类古代文化史分成上古、中古、近古三段,那么近古则是对中古的继承和发展,而其在实现对中古文化的否定时往往借助于对上古文化某些因素的“复归”,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复古”。清初思想界众多思想家在总结明亡清兴的教训时纷纷将批判的矛头指向明王朝的君主专制,同时又不约而同地打开先秦的思想宝库,从中请出富于原始民主精神的尧舜——三代之治,以之作为批判君主专制的思想武器,同时借助于此来表达自己某些富于“新变”的思想。由此可见,清初复古思想中新变与复古并非绝对对立的两个不相干的方面,二者实为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诚如清人吴乔所说:

诗道不出于复变,变谓变古,复谓复古。变乃能复,复乃能变,非二道也。<sup>[7]</sup>

吴乔所论虽为诗道,但又不限于诗道,清初复古思想中的复古与新变的辩证关系正可以从中得到诠释。民族传统的反思与当代意识的求索,是创立新说的两大依据,是哺育新思想的两个相反而又相成、既冲突又互补的必要条件。清初“复古思想”正因为基于这两大依据,所以才不仅不被历史所遗忘,反而在思想史上愈发显出其耀眼的光辉和独特的历史地位。

#### [参考文献]

- [1] 梁启超. 清代学术概论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 [2] 黄宗羲. 明夷待访录未刊文·封建 [A]. 黄宗羲全集 (第1册) [M].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5.
- [3] 黄宗羲. 明夷待访录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 [4] 顾炎武. 顾亭林诗文集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 [5] 颜元. 王道 [A]. 颜元集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7.
- [6] 李亦园, 杨国枢. 中国人的性格 [M].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6.
- [7] 吴乔. 围炉诗话 [M]. 张钧衡刊适园丛书本.

责任编辑: 杨向艳

#### (上接第 113 页)

[32] 陈春声. 论清代广东的常平仓 [J]. 中国史研究, 1989, (3); 清代广东社仓的组织与功能 [J]. 学术研究, 1990, (1); 市场机制与社会变迁——18 世纪广东米价分析 [M].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1992; 论清末广东义仓的兴起——清代广东粮食仓储研究之三 [J].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1994, (1).

[33] 罗一星. 明清佛山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 [M].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4.

[34] 王笛. 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 1644-1911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1.

[35] 袁海燕. 清代江西的家族、乡绅与义仓——新城县广仁庄研究 [J].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2002, (4).

[36] 任放. 明清长江中游市镇经济研究 [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3.

[37] 姚建平. 清代两湖地区社仓的管理及其与常平仓的关系 [J]. 社会科学辑刊, 2003, (4).

[38] 白丽萍. 清代两湖平原的社仓与农村社会 [A]. 陈锋主编. 明清以来长江流域社会发展史论 (第十章) [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6.

[39] 吴滔. 清代嘉定宝山地区的乡镇赈济与社区发展模式 [J].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1998, (4); 宗族与义仓: 清代宜兴荆溪社区赈济实态 [J]. 清史研究, 2001, (2); 清代江南社区赈济与地方社会 [J]. 中国社会科学, 2001, (4).

[40] 黄鸿山, 王卫平. 传统仓储制度社会保障功能的近代发展——以晚清苏州府长元吴丰备义仓为例 [J]. 中国农史, 2005, (2).

责任编辑: 杨向艳



Therefore, in order to settle the straits of industrial transition, it must not depend on the governmental propaganda or administrative decrees. The proper way should be to create and offer some suitable conditions and encouragements to the subjects of export-type economy for their industrial transition and upgrading.

### **A Dynamic Analysis Framework and Positive Study of China's OEM Enterprises Enhancing Degree**

*Mao Yunshi, Wu Yao and Zou Hongxing 63*

In the financial crisis, OEM enterprises upgrading becomes very important. Based on literature review,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factors, paths and effects of OEM enterprises upgrading and their relationship. Then a dynamic analysis framework of OEM enterprises upgrading is brought up and examined by some examples of furniture enterprises. We find that OEM enterprises upgrading is a continuous, dynamic and evolutionary process, with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affecting their selection of path, and in turn, their selection of path affects the effects of enterprises' upgrading and their reaction to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and so on. Finally, some further possible orientation of research is discussed in the later part of the paper.

### **An Academic Reflection on the Studies of the Change of Modern Chinese Society in Recent Years**

*Wang Rigen and Chen Yao 107*

The studies on the change of modern Chinese society have undergone a transition, from a view of taking the west as the center to that taken China as the center in the last 30 years. And some deputies following this are that if the force and mechanism promoting the transition of modern Chinese society came from the change from the traditional time to the modern time, that what effects were made respectively by governments and folk, that if the change was guided mainly by government or by the people, and that if the locality formed in the traditional society still play some role in the modern society transition. A brief review and reflection on the above problems will be certainly helpful to a deeper research.

### **The Cultural Content of the Thought of Restoring Ancient Ways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Tian Qinyun 114*

The tendency of restoring ancient ways in ideological and cultural fields can be traced back to as early as the early Qing dynasty. The thinking of restoring ancient ways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is a reflection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onfucian view of history in the specific historical conditions. The restoring of ancient ways is just an outside appearance. Its essence is something of new change, i.e. the thinkers made use of restoring ancient ways to criticize the realities, in order to cause a social reform.

### **On the Daikokuten Worship and the Origins of Sino-Japanese Opera Gods**

*Qiu Yafen 144*

Under the great cultural context of the eastward expansion of Buddhism, Chinese transformed Daikokuten, a household guardian deity in Buddhism, was spread to Japan from China. Daikokuten worship built up a bridge between Chinese opera and Japanese opera. It has made the cultural heritage of Sino-Japanese puppet opera present astonishing consistency. This article is one initial achievement of a research on Sino-Japanese opera god origins, revealing the commonality between the Chinese opera god and the Japanese god of puppet opera, Hyakudayu, which is a golden opportunity for better understanding on the cultural heritage of Sino-Japanese puppet opera, and on exchange problems centered in the Sino-Japanese opera.